

俞晓秋

董云虎

陈江丰著

百年治国方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探

BAINIAN
ZHIGUO
FANGLUE

俞晓秋

董云虎

陈江丰著

百年治国方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叶国斌 虞文军

封面设计：杨锡康

责任校对：张谷年 张振华

百年治国方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探

俞晓秋 董云虎 陈江丰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2.7 万 印数 1—11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1129-4/D·168 定 价：7.80 元

目 录

序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及其目标	(33)
一、	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33)
二、	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	(37)
三、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	(42)
四、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蓝图	(50)
五、	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治国方略	(59)
六、	发展是硬道理	(66)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74)
一、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74)
二、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92)
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02)
第三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	(123)
一、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23)
二、	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要逐步进行	(133)
三、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保民主制度化	(144)
四、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154)
第四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	(163)

一、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63)
二、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176)
三、马克思主义与精神文明建设.....	(188)
第五章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	(202)
一、开放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202)
二、对外开放的策略与方针.....	(213)
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223)
第六章 “一国两制”的思想.....	(232)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时代背景	(232)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	(242)
三、“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	(258)
第七章 注重“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思想.....	(266)
一、邓小平国际战略观的提出.....	(266)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构架.....	(268)
三、和平与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之精华.....	(281)
四、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国际战略 思想之比较.....	(288)
后 记.....	(298)

序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其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自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今后还将继续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特别是对正处于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它是实践的产物，它来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为什么十四大报告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要回顾这段历史？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准确地概括出这一理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这一理论？一个重要方法，是把这一理论放到产生它的实践过程中去学习、认识和研究。

党的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归纳为 9 条。这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它有一个随着实

践和认识的发展而继续发展的过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这在理论界有不同观点。从远一点说，我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探索，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最早是在 1956 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那时起，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精辟地概括了从 1956 年到 1966 年 10 年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正确思想观点。这些都应被看作是这一理论的重要来源。

从近一点说，这一理论是从 1975 年邓小平亲自领导全面整顿工作时产生的。他在那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有些就是这一理论的直接组成部分。比如，全党讲大局，大局就是“四化”建设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等等。邓小平曾经说，拨乱反正从 1975 年就开始了，改革从 1975 年也开始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离不开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然而，它更重要的来源是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全局和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一实践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因此，我们对这一理论的形成的研究和探索，也从这时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全面展开到逐步深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一个从初步提出、逐步完善到完整形成的过程。在这期间，我们党召开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是对实践和认识的一次总结，都标志

着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们便以此为依据，把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十二大。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提出阶段，之所以叫初步提出，是因为邓小平在这段时间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并且形成了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基本内容。这一理论命题和基本内容是在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当时，尽管工作重点已经转移，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是非和历史问题，我们党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进行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问题上全面展开。首先是思想路线。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提出，到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再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近两年时间的争论，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全党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在领导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邓小平抓住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一关键问题，提出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确立和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认识的端正，使得其他一系列复杂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是非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例如，“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问题，一大批冤假错案问题，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如何看待毛泽东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乃至如何正确评价和认识建国以来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等等。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上述问题作了总结和交待，标志着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胜利结束。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但对我们成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使我们从徘徊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对于我们开辟未来，进行“四化”建设和改革，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我们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下气势磅礴地展开的，并由此逐步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十四大报告归纳这一理论的9条中，把它列为第一条。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恢复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称之为“最大的拨乱反正”。之所以会实现这一转移，一个重要原因，是严酷的现实教训。中国从1957年开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1978年共21年，经济上可以说没有得到很大发展。1957年农民人均收入70元，1977年仍是70元。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人统计，十年动乱，中国的直

接损失达6000亿元人民币，以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正是在这20年中，世界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国内外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如再不以主要精力抓经济建设，就已不是什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一点，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最早认识这个问题，并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邓小平。1975年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1977年他再次复出，在强调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这里要特别指出，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此，而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穷过渡”是不是社会主义？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恰恰是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道理，他在当时阐述工作重点转移时就反复讲过。这种认识，从理论上支持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使这一转移的意义更加深刻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和工作重点转移的观点，解决了什么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问题，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路线、政治路上的拨乱反正完成以后，我们又进行了组织路上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理论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拨乱反正、特别是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正确、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形成的。这一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明确的说明，并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

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①《决议》总结了 10 条。这 10 条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四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长征。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二）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开始。这一实践是在两个领域里同时进行的，一是经济建设领域，一是思想政治领域。

在经济建设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不久，1979 年 3 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针对“文化大革命”和“洋冒进”造成的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工作重点转移以后，我们在考虑“四化”建设问题时，首先面对的是“洋冒进”带来的严重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思想路线还未端正，在经济建设上，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不顾国家的实际可能，继续执行“左”的一套东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这是当时一个很现实的教训。中央工作会议吸取和总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5 页。

结了这一“左”的教训，并进而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错误，是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由此，党中央形成一个共识，即搞建设一定要首先认真研究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当时说的一段著名的话中：“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 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此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明确指导方针。

中央工作会议所以能够这样客观地研究我国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方针，显然是与我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有关。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反映在我们对待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问题上。比如，在看待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问题上，过去，我们总是说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这一口号第一次提出是在 1964 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宣布的。当时距本世纪末还有 36 年，以当时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当时的现代化水平和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们再提这样的口号，就不那么客观了。1979 年 12 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实事求是地提出，我们的现代化与你们的不一样，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争取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000 美元，实现小康社会。他后来解释说，过去我们张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目标放低一些。邓小平从这一角度再次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仍然是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3 页。

代化建设的意思。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后来不再使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提法，党的十二大代之以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形象而具体的目标。而十三大则提出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现代化建设起步的同时，改革也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认识到改革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的讲话和随后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讲话中，都谈到了改革问题。当时改革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下面缺乏活力，因此，要扩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另一个问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因此要恢复按劳分配，打破“大锅饭”。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是为了搞活经济，调动积极性，打破平均主义。这些改革措施具体地说，就是农业打破“以粮为纲”，尊重农民自主权，搞多种经营；工业打破“以钢为纲”，综合平衡，理顺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责任制试点。

在改革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是农业，农业是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农业问题，然而农村的改革却是农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安徽、四川两省的农民群众在党内还有相当同志没有摆脱“左”的束缚的情况下，顶着巨大压力，率先改革，创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形式，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和党中央采取让事实说话，让实践结果教育全党的办法。结果，凡是搞了责任制的地方一年大变样。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这两个省的农村改革。改革开始在全国推广。

同时，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也真正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即成立了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中央要求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贸易，并在引进利用外资方面开始探索。然而，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对外开放步骤，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就在1979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提出利用广东的地理环境优势，采取特殊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设想。邓小平坚决明确地表示支持，他说划出一块地方，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这几句干脆的话，使我国对外开放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作出这一决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许多同志思想还很僵化，怀疑这样搞会不会搞成资本主义。特区建立之后，对它一直有争论，直到前两年还有姓“资”姓“社”的疑问。邓小平的态度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冒，让实践来说话。

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另一领域是思想政治领域。1979年初，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之前，中央召开了另一个重要会议，即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当时，党正以主要精力批判“左”的思想倾向，却同时出现了妄图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的倾向。邓小平及时抓住这个苗头，坚定地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又不断强调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当时，许多同志不能理解，认为现在“左”的思想那样严重，思想刚刚解放一点，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又重新导致思想僵化。以后的实践逐步教育了全党，证明了邓小平当时及时坚决地提出这个问题的英明和正确。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我党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对外开放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所造成的思想信念的动摇、纪律的涣散，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邓小平指出，精神文明中不但包括文化教育等，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以后又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为此，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的思想相配合的。1982年后，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 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提出的重要标志。

在拨乱反正、全面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两个领域的实践过程中，我党逐步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一总任务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这几年的实践中，全党逐步加深对现代化任务认识的结果，即认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主要是经济上的现代化，或叫四个现代化，因此必须牢牢保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毫不动摇。但是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又不仅仅是这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的含义包括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广泛领域。它不但要求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求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和高度的民主。如果从更高的政治角度来说，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完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探索出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命题的真实含义。这一理论命题刚提出时，恐怕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特别注意，它的深刻含义也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然而以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告诉人们，它并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不是偶然提出的一句话。它实际上是对我们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党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10月十二大这4年时间的实践总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以后的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一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认识也愈加深刻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题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提出的重要标志。而它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一理论的大多数重要观点和基本内容都在这一阶段的实践中产生了。这一点我们上面已提到。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民主法制的思想，“两手抓”的思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等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已具雏形。

然而，在这一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仅仅是初步提出。这是因为，第一，构成这一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还没有形成，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而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内容虽已提及，但还没有概括出来。第二，这一理论的许多内容虽已提出，但还不成熟

和完善。如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只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还没有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完整设想；外交战略上还没有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成熟思想和完整概念；“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思想还表述得不完善；等等。第三，这一理论还比较零散，没有系统化，完整化，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思路。

理论认识上的不完善，归根到底是实践发展程度决定的，如上所说的这一阶段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在拨乱反正中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因此它的完善还有待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

第二阶段，1982年9月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十三大。这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全面展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完善的阶段。

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实践全方位展开。在经济领域，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从单一的改革走向全面改革，从浅层次改革走向深层次的改革。对外开放方面，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回京后作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建立海南岛特区等重大决策，以后又决定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一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形成。邓小平在这段时间还提出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智力等思想。大批三资企业开始建立。

在政治思想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改革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真正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人们改革开放的意识大大加强，开阔了眼界，思想更加解放。同时，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83年10月开始整党，继续肃清“左”的影响，同时注意右的倾向，强调法制，坚持两手抓。1983年10月十二